

翻译类作品的质量越来越差了吗

——关于译作的那些“误会”

本报记者 张文

在一些读书论坛里,经常能看到读者对译作的吐槽,诸如语感不好、欧化句子多、错译等等。有的读者还为此专门苦练外语,只看原著。

如今的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在九久读书人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看来,这个说法“不准确”。纵比横比之下,翻译行业目前确实存在很多乱象,但是,读者也确实对这个行当存在一些误会。

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

“语言晦涩,不是平常阅读的风格,不知道译者是怎么想的。”

“川端康成的《雪国》出了3个译本,新出的实在不好,语感不行,不够优美,欧化的句子也比较多。”

“《战争史》这本书,同一个专有名词,过了这段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前后翻译不统一得大明显。”

“如果一本书有原本,我宁愿看原本。看完之后才发现,中文版的有些拗口,一些翻译也不是很准确。”

这些吐槽,来自于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

在网上,一篇名叫《译著有危险,读者需谨慎》的帖子广为流传,其中梳理了网友列举的十多本社科名著,像《通往奴役之路》、《罗马帝国衰亡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译作均上了黑名单。一些知名出版社和著名译者纷纷“被打脸”。

近些年,外文引进图书的翻译质量问题引起不少讨论。翻译“Google体”、分段外包等乱象层出不穷,一些译者甚至一年能译出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20多部作品,“最纯正、最优

美、最准确的译文”之类宣传语,也赫然登上了腰封。

《译著有危险,读者需谨慎》这篇集纳了众多读者意见的帖子,为如今的翻译界下了一个判断:“近三十年来,翻译界无大家,翻译遂成了一项专业技术。”

而在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看来,中国译介事业的状况可用“欣欣向荣,问题多多”8个字来概括。这个观点,多年未变。2014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林少华说,如今翻译作品大概占出版市场30%到40%的份额,可谓“大蛋糕”,翻译队伍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但是,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也确实存在。

如今的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在九久读书人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看来,这个说法“不准确”。

何家炜说,如果拿过去和现在比,民国时期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出版的书很少。而现在,是书多、品种多。如今市场扩大,需要大量的译者来从事翻译工作。人一多,译作良莠

不齐的情况便无法避免。

比较老译本和新译本的话,新译本不如老译本的情况也确实存在。“明明市面上已经有好几个译本了,一些出版社还是想出来赚钱,分一杯羹。”何家炜说,这是出版从业者唯利是图的心态问题。

但是,何家炜认为,读者对翻译这个行当存在一些误会。

现在,一提到老一辈的翻译工作者,比如傅雷、钱钟书、林语堂、丰子恺等大家,“人们会觉得他们的古文好,文字功底好。但那毕竟也是少数。”何家炜说,其实在“70后”译者群里,也有一大批好的译者。“他们都很优秀,只是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作者拿到手里的译本,也不一定是善本,完本。对于出版社来说,虽然在出版前的各个环节都尽力把关消灭错误,但实际的情况是“无错不成书”。

“我们当然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这都激励着编辑和译者,但是如果一味指责翻译质量不好,是片面的。”何家炜说。

出版行业仍在转型期,选择好的译作各有窍门

王智量认为,现在翻译界最大的问题是对译者不够重视,一方面是劳动成果的回报太低,另一方面是译者没能得到足够的尊重。“对于青年译者,要爱护他们,尊重他们。”

何家炜则觉得,提高图书定价是改变译者生存状况的一个办法。“如果能把书的价格提高2到3倍,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补贴译者,或许现在的情况会有所改观。你不能既想看好作品,又让译者没饭吃。”

现在是一个出版业的转型期,何家炜说,很多问题会随着市场化而来。对于译作水平的参差不齐,一位分析人士表示:“出版行业市场化的时间不长,或许经过大浪淘沙的自然选择之后,各方面也会慢慢规范起来。”

在一家出版社做译作审读工作的沈先生对这一看法不乐观。“现在的出版社都既讲经济利益,也讲社会利益,但实际上盈利还是第一位的。如果读者对于规范译作市场的呼声不足以高到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专管机构采取一系列规范和措施来建立一个好的出版体系,出版行业怎么会慢慢变好呢?”

对于读者来说,更快地看到译作,看到好的译作,市场也给出了更多可能。

2012年出版的《斯皮尔伯格传》,其译者是已经解散的人人影视字幕组。正是因为这群电影字幕翻译组对于电影的热爱以及对专业知识的熟练,才有了这部在一位电影专业毕业生看来“近年最好的电影人物传记”。

2011年出版的《史蒂夫·乔布斯传》中文版,是采用众包形式翻译的。出版方招募翻译团队,每个译者负责具体的章节,最后再进行统筹。对于众包翻译的模式,何家炜认为应该看书的具体内容。“如果是需要迅速面世的畅销书,采用众包翻译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翻译经典著作的话,何家炜认为还是需要有一个译者从头到尾负责比较好。当然,翻译的整个过程也不一定是封闭的,“可以借助外力,找其他朋友帮忙,找懂原作母语的外国朋友交流,在翻译论坛上和同行讨论,请教老前辈。”

读者现在也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一本书的口碑。读了《雪国》3个版本的张刚说,自己挑书主要是挑出版社,像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南京译林等社翻译的书目质量都比较高。看多了看久了,也会循着自己的阅读经验找同一个译者的作品来买。

曾经在豆瓣网发起过“一星运动”的何家炜或许会很高兴看到这样的页面:在他曾经号召抵制的某个经典文学作品的译本网页上,最前面的几条都齐刷刷地给了一星。

为了减少读译作的风险,资深读书人梁浩宇想了一个省事的办法,“我都看靠谱的朋友推荐的以及评分还不错的书”。

翻译价值被低估,难吸引人才

“说翻译质量不好,其实不能全怪到译者头上。”何家炜认为,一些译者可能存在能力上的不足,但是确实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翻译很难。”这是何家炜和翻译专业的硕士生小吕共同的感受。

“我们其实很不容易。现在不少人以为这只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切换,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小吕说,翻译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原因去推敲。“在翻译课堂上,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份作业。”但是同时,老师也会告诉大家,真的到了工作岗位上,“没有必要花精力”在这些细枝末节上。

不是说译者不想精益求精,而是“时间太少了”。小吕说,自己在校期间接过翻译活儿,有些书目几天就要成品,留给翻译者的时间实在有限。

对于出版社来说,因为出版周期所限,他们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和译者进行沟通,好好打磨一部作品。而对于从事图书译介的译者来说,时间同样宝贵。何家炜介绍,图书引进版权后,一般要求在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内出版。“真正留给译者的时间不到一年。”而很多译者也并非专职从

事翻译工作,他们还必须在这不到一年的业余时间把翻译做完。如同一句翻译界的名言说的,“翻译永远有遗憾”。

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则是钱。

据了解,现在做图书翻译,译者所得的稿费约在60—70元/千字。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王智量说:“要翻译出够出版水平的文字,一天2000字都是很不不容易的。”

王智量的译著包括《安娜·卡列尼娜》、《叶甫盖尼·奥涅金》等30余部。但他却发现,自己辛苦翻译一天的收入,还不及自己在医院请一个护士要的工资。

据何家炜了解,现在专职做翻译的很少,因为“大家没法只靠稿费生存”。去年,在文化界人士持续多年的呼吁下,国家版权局与发改委联合发布了《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对稿酬标准进行了提高,翻译基本稿酬由1999年旧办法规定的每千字20—80元,增至每千字50—200元。

尽管翻译稿费有了提高,但因为学术界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不够,降低了优秀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的热情。在高校里,译作不算学术成果,这一

点让88岁的王智量很难受。“我有一个翻译学的研究生,现在在华东师大教书。他60多岁了,已经做了12年的副教授,却还评不上教授。因为他没有学术成果。”

王智量很痛心:“他翻译出了歌德的《浮士德》啊!”王智量认为,一个教翻译的老师的译作如果不能算学术成果,实在是太不公了。“想到这个,我甚至会流泪。”

正是因为看到了搞翻译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很多翻译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并没有选择对口的工作。2014年,小吕所在专业的毕业生总计约30人,只有一人选择做专职翻译,一人做自由翻译,另外大部分人去了企业或者做了老师。

小吕很理解学长学姐们的选择。“翻译这个事,需要很高的天赋和很大的努力。”她觉得现在的翻译市场不是很好,毕业生的资源也少,很容易面临收入不稳定的窘境。另外如果自己的能力不足,要学的东西很多,面临的压力也会很大。“在翻译过程中,你经常会不确定自己要面临哪方面的问题。”

何家炜也说:“我有很多外语很好的朋友,都不愿意做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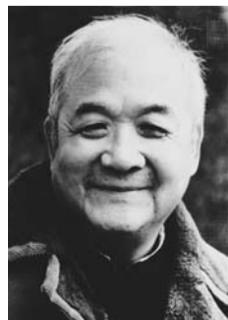
著名翻译家傅雷
代表译作主要有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文学作品



著名翻译家杨绛
代表译作有《堂·吉珂德》、《吉尔·布拉斯》等



著名翻译家赵萝蕤
代表译作有《荒原》、《草叶集》、《哈依瓦撒之歌》等



著名翻译家萧乾
代表译作有《尤利西斯》、《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等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